

高質量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目標方位*

陳章喜

[提 要] 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粵港澳大灣區具有獨特的區位地理優勢,是國家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和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的重要平台,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通過對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現狀判斷與量化評估,發現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呈現出穩步提升的良好趨勢,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態勢明顯,內部呈現出非均衡性和穩定性的時空演變特徵。根據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存在的問題,提出了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本路徑與策略。

[關鍵詞] 經濟高質量發展 實證評價 粵港澳大灣區 熵值法

[中圖分類號] F20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2 - 0026 - 12

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正在實踐中。2021 年 9 月 5 日頒布的《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明確提出,到 2035 年,琴澳一體化發展體制機制更加完善,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目標基本實現。2021 年 9 月 6 日頒布的《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指出,開發建設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的重要意義在於支持香港經濟社會發展,提升粵港澳合作水平。2022 年 6 月 14 日,國務院正式發布《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支持南沙打造立足灣區、協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戰略性平台。這是繼 2021 年出台橫琴、前海兩個合作區方案以後,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作出的又一重大決策部署,為南沙發展注入新的強勁動力。2022 年 10 月,中共“二十大”報告重申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好發揮作用。^①由此可見,國家期望以部分區域為試點,探索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一體化發展的“一國兩制”道路。

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將為我國新發展格局的形成提供示範。要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一體化發展,從目前粵港澳三地的合作的實際情況來看,科技創新是一個重要的突破口。

*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新時代‘一國兩制’理論與澳門成功實踐研究”(項目號:19BKS039)的階段性成果。

粵港澳大灣區包括廣東省 9 個城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人口規模超 8,600 萬，總面積約 5.65 萬平方公里，2020 年，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總量超過 11.5 萬億元，比 2010 年增加 108.19%，2021 年，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總量達到 12.6 萬億元，位居世界灣區前列。但從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的內部情況來看，由於經濟發展水平、政策環境、制度環境等不同，粵港澳三地經濟發展程度不同步、創新發展路徑不協調、生態發展環境不平衡問題也很明顯。因此，推行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有利於實現粵港澳大灣區資源稟賦的優勢互補，有利於生產要素的高效配置，有利於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對於提高地區生產力、建設以創新為特徵的區域增長極和世界一流灣區具有重要意義。

一、文獻回顧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均明確提出，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形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成全球科技創新高地和新興產業重要策源地，以便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要實現國家對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質量、科技創新與新興產業發展的戰略定位，粵港澳三地就必須形成協同發展的態勢，因此廣東率先在經濟、科技創新領域逐步實現單邊開放，如支持港澳在廣東設立研發機構，推動科技設施和科學儀器在粵港澳三地共建共享，實現廣東省財政科研資金直接撥付港澳機構使用等，以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創新和新興產業發展能級的整體提升。

作為國家建設世界級城市群和參與全球競爭的重要空間載體，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的對外開放高地，經濟實力雄厚，集聚了大量優質的科技創新要素，是我國創新資源最集中、科技創新水平最高的區域之一。在未來發展的戰略層面上，粵港澳大灣區要形成以創新為主要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在新發展階段，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有利於充分發揮粵港澳各自優勢，深化內地與港澳交流合作，對粵港澳大灣區建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和世界級城市群起到關鍵作用，對粵港澳大灣區周邊城市具有重要的引領和帶動作用。

粵港澳大灣區的相關研究一直是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問題，理論界關於粵港澳大灣區的研究，主要為以下幾個方面：(1)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競爭力的研究。(2)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戰略的研究。(3)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制度創新的研究。(4)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歷史演變的研究。(5)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城市聯繫的研究。(6)對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發展的研究。目前，理論界對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研究，主要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萬曉瓊、王少龍基於粵港澳大灣區在數字經濟方面的優勢和數字經濟特點，認為數字經濟將助力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數字經濟和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將引領我國新發展格局的形成；^②陳章喜、顛孫冠華選取指標建立評價體系，發現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度在小幅度穩步上升，由輕度失調變為初級失調，但距離優質協調還存在一定的差距；^③孫久文、殷賞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應立足多維度定位，落實構建高質量產業體系、強化產業鏈樞紐作用、創新粵港澳合作制度、打造共享試驗田、提升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等發展戰略，增強在國內大循環中的樞紐地位和國內國際雙循環中的門戶作用；^④段秀芳、沈敬軒利用熵權 TOPIS 法和非期望產出的 SEB-DEA 法綜合評價城市發展水平，發現創新發展類、對外貿易類指標對城市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程度最大；^⑤賴文鳳、許萌、吳雨晴選取高技術產業增加值為主要研究指標，運用重心分析方法對粵港澳大灣區高技術產業的重心變化軌跡及發展差距進行分析，變動軌跡呈現向右傾 U 形軌跡，表明大灣區高技術產業城市間差距先縮小後又擴大，其原因是港澳自改革開放以來發揮不同的擴散效應，以及珠江對香港向西岸輻射的阻隔效應及高技術

產業的集聚效應；^⑥陳章喜根據區域協同創新的理論，通過構建區域協同創新的指標體系，運用計量分析方法，實證分析了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的協同度。研究發現，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的協同度處於弱協同的狀態，區域協同創新的協同程度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並提出了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效應的路徑；^⑦凌連新、陽國亮利用熵權 TOPIS 法構建指標體系探討 1996~2018 年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發現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水平呈現出四大核心城市的高度集聚、橫向縱向的高度波動性、水平變動的交錯複雜性，等級演變呈現出“兩頭小、中間大”的特點。^⑧

根據現有文獻，對粵港澳大灣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體制機制、功能定位、發展戰略、產業布局、高質量發展測度等方面，但囿於理論與實踐兩方面的約束，在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標準、評價指標體系、評價方法與內容以及發展機制等方面，還存在著一系列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重點發展的大型城市群，是國家“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平台，也是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的重要平台，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戰略的實施，粵港澳區域合作必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本文基於 2010~2021 年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的數據，在理論與實證的結合上對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系統的分析與詮釋。

二、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理論判斷

1. 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內涵

高質量發展是中共“二十大”報告對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進一步轉換所作出的重要判斷，是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要求。雖然報告中沒有對高質量發展進行嚴格定義，但對如何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作出了明確闡述，即“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等”^⑨，此闡述成為學術界討論經濟高質量發展理論內涵的重要依據。

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什麼是經濟高質量發展，主要表現為經濟增長的效率更高和持續性更強，經濟發展與社會、生態環境更加協調，經濟發展的成果能夠惠及廣大的人民，更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求；二是如何達到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狀態，要持續優化現有經濟體制和產業結構，建立以創新為發展驅動力、對外開放為活力源泉的現代產業體系。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指區域內城市協調合作、優勢互補，以創新為第一驅動力，不斷擴大對外開放，在實現經濟效益穩步提升的過程中，確保經濟、社會、生態的良性互動。

2. 區域經濟高品質發展的主要內容

(1) 經濟整體發展。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經濟增速放緩，側重經濟質量提升。社會需求引領供給體系優化升級，優化商品的社會勞動生產率，並帶動新一輪需求，推動商品和服務的質量更新更好，生產要素的投入產出效率更高，微觀主體的經濟效益更強，促進我國實現高級化、現代化的現代產業結構，在國際產業鏈中的地位持續向中高端攀升。

(2) 創新驅動發展。科技創新是優化區域經濟結構、破解經濟發展阻礙、實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的根本措施，其作為“乘數”作用到生產要素的正態效應中，實現生產要素經濟效益更大化，促進打造以新技術為支撐的新產品和新服務，形成競爭新優勢，在解決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深層次矛盾的同時，實現了產業結構的升級優化以及更為長遠的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

(3) 對外開放發展。對外開放是發展的必由之路和強大動力，區域主動擴大對外經濟交往，放寬經濟政策、取消各種交往限制，大力發展進出口貿易投資，合理利用外商投資，積極引進有助於企

業技術進步的高端人才和先進設備,發展開放型經濟,促進區域經濟健康快速發展,形成國家全面對外開放的格局。

(4)生態綠色發展。人類命運與生態環境息息相關,新時代我國的社會基本矛盾要求經濟社會實現綠色科學發展。節能降耗、保護環境,樹立綠色發展理念,倡導綠色消費方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創生態全要素的高效配置和協調融合,實現由資源節約型向環境友好型社會的轉變,打造青山常在、天空常藍、空氣常新的宜居生態環境,是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

(5)發展成果惠民。一切發展為了人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根本目的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享有發展成果,共享發展是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通過政府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區域之間共享科學技術成果、全體人民享有公平的基本服務,讓經濟高質量發展成果更多更好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

三、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現狀描述

1. 經濟整體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以建設世界級城市群為目標,產業鏈互補、集群優勢明顯、經濟聯結緊密,灣區內各城市的產業結構總體而言以第二、三產業為主,香港、澳門、廣州、深圳作為灣區內的核心城市,香港和澳門是我國重要的經濟中心和對外開放的主要窗口,廣州以第二、三產業為主,主要發揮對外服務與貿易中心的地位,深圳的高科技製造中心優勢明顯,金融、服務業等第三產業也領先全國,其他灣區城市也積極地承接核心城市的經濟輻射和產業轉移。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 GDP 總量 10 萬多億元,超越紐約灣區,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到 2021 年,粵港澳大灣區地區生產總值達 12.6 萬億元,以全國 0.58% 的土地面積創造了約佔全國 12% 的經濟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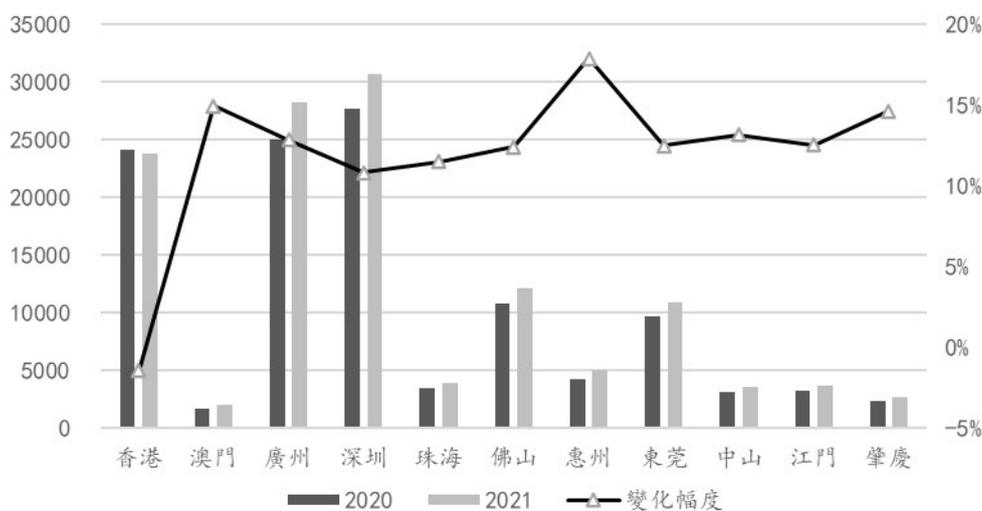


圖 1 粵港澳大灣區 2020、2021 年各城市的 GDP 情況及變動幅度

2. 創新驅動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乃至全球最具活力的城市群之一,在科技創新領域如信息技術、高端製造、智能裝備製造方面已經形成良好的新興產業基礎,其創新活動最主要的行為主體是高校、高端研發機構、高技術企業。高校方面,粵港澳大灣區現有 173 所高校,其中 5 所香港的大學進入 2021

年 QS 世界大學百強。灣區在校學生超過 250 萬人,集聚了豐富的知識、技術和人才資源。華南理工大學專利申請量(19,717)和有效專利數量(11,599)居全國高校第三位,專利授權量(13,315)排名第四。深圳大學和華南理工大學分別以 861 件和 562 件 PCT(專利合作條約)公開量,排名世界高校第六和第十位。研究機構方面,粵港澳大灣區共有 43 個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有 16 所國家重點實驗室和 6 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科技研發能力和創新能力位居全國前列。粵港澳大灣區共設立了 277 家新型研發機構,其中 6 所港澳高校在廣東省參與共建了 9 家新型研發機構,共促智力化創新成果的孵化和轉化。企業方面,2020 年,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高新技術企業數量為 50,999 家,以華為、騰訊、比亞迪、華大基因、大疆創新等為代表的一批領先世界的創新型企業,這些企業的 PCT 國際專利申請數量佔了全國總量的一半,是帶動粵港澳大灣區企業整體創新水平提升的重要動力。

3. 對外開放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位於珠江通往南海的重要出海口,擁有香港港、深圳港、廣州港等世界級集裝箱港口,是我國早期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開放程度領先全國,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粵港澳大灣區內有香港、澳門 2 個自由貿易港,擁有廣州南沙自貿區、深圳蛇口自貿區、珠海橫琴自貿區 3 個自貿片區。2021 年,粵港澳大灣區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為 1,537.4 億美元,出口達 13,857.7 億美元,港口貨櫃吞吐量為 8,314.8 萬標箱。其中廣東自貿試驗區實際利用外資 82.41 億美元,新設內資企業、外商投資企業 23,450 戶、2,925 戶。2021 年 6 月 23 日,隨著粵港澳大灣區首個全自動化碼頭“廣州港南沙四期工程”的建成,廣州南沙港區每年集裝箱吞吐量預計可超過 2,400 萬標準箱,位居世界單一港區前列。粵港澳大灣區加快對外開放,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在國際產能合作中發揮了重要引領作用。

4. 生態綠色發展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指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要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粵港澳三地政府在 2014 年 9 月簽訂《粵港澳區域大氣污染聯防聯治合作協議書》,加強區域合作,優化區域空氣監測網絡,包括增加監測站數目和監測因子,及每小時發布各種空氣污染物的即時濃度數據。根據粵港澳珠江三角洲區域空氣檢測網絡 2020 年監測報告,灣區 SO₂、NO₂、O₂、CO、PM₁₀、PM_{2.5} 年平均值皆符合年平均標準限值。2006 年至 2020 年期間,監測網絡測得的 SO₂、NO₂、PM₁₀ 的年平均值分別下降了 86%、43% 及 49%,呈現明顯下降趨勢,灣區內生態環境質量得到明顯改善。

5. 經濟共享發展

近年來,粵港澳三地之間合作程度不斷增加,經濟聯結更加緊密、人才流動更為頻繁。2019 年 11 月 6 日中央為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公布了 16 項政策措施,惠及香港市民及便利不同界別人員到大灣區發展,與此同時,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港珠澳大橋、蓮塘口岸、南沙大橋等的建成通車,不斷擴大灣區內的“1 小時”城市生活圈,促進三地區之間要素流動和經濟文化交流,形成了部分年輕人在香港工作、在內地生活的新興局面。根據國家移民管理局公布數據,2019 年,香港、澳門來往內地出入境人次分別為 1.6 億人次、5,358.7 萬人次;2020 年至 2022 年間,受新冠疫情影響,粵港澳三地間的經濟社會交流及民生共享也一度受到抑制,直至 2023 年初恢復通關後趨向復常。

四、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實證評價

1. 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包含多個維度,並且由多個因素交錯影響,本文基於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現狀,借鑒現有研究中的指標體系選取,考慮指標數據的科學型、系統性和可獲得性,從經濟整體發展、創新驅動發展、對外開放發展、生態綠色發展、發展成果惠民五個維度選取了25個指標,構建如表1的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表1 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目標層	準則層	指標層	單位	指標屬性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經 濟 高 質 量 發 展	經濟整體發展	人均 GDP	元	+
		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第二產業增加值/第三產業增加值)	%	-
		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第三產業增加值/GDP)	%	+
		投資率(固定資產投資額/GDP)	%	+
		勞動生產率(GDP/就業人員數)	%	+
		金融機構存款餘額/GDP	%	+
	創新驅動發展	專利授權量	項	+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 R&D 人員數/就業人員數	%	+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 R&D 經費支出/GDP	%	+
	對外開放發展	出口依存度(出口總額/GDP)	%	+
		進口依存度(進口總額/GDP)	%	+
		外資依存度(實際利用外資額/GDP)	%	+
	生態綠色發展	留宿旅客總人數	萬人次	+
		單位 GDP 電力消耗量	千瓦時/萬元	-
		單位 GDP 能源消耗量	噸標準煤/萬元	-
		建成區綠化覆蓋率	%	+
		二氧化硫平均濃度	微克/立方米	-
	發展成果惠民	可吸入顆粒物平均濃度	微克/立方米	-
		教育經費支出佔財政支出的比重	%	+
		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	元	+
		人均擁有公共圖書館藏書量	冊	+
		移動電話普及率(移動電話用戶數/人口總數)	%	+
		千人擁有醫生數	人	+
		千人擁有醫院床位數	張	+
	人口死亡率	‰	-	

2. 評價方法引介:熵值法

本研究通過熵值法確定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中各項指標的權重。熵值法,系統內各個指標的權重是由數據自身無序化生成的信息熵來確定的,即指標數據的變異程度,是一種客觀賦

值法,可以反映數據的隱含信息和避免人為因素的影響。

首先,對數據進行無量綱處理。由於數據的計量單位不同,消除量綱影響,對原始數據採取數據平移,正向指標和逆向指標的處理方法存在差異,如下所示:

正向指標:

$$Y_{ijt} = \frac{x_{ijt} - \min x_j}{\max x_j - \min x_j} \quad (1)$$

逆向指標:

$$Y_{ijt} = \frac{\max x_j - x_{ijt}}{\max x_j - \min x_j} \quad (2)$$

公式中, x_{ijt} 為第 t 年 i 城市第 j 項指標的原始數值, Y_{ijt} 為標準化後的第 t 年 i 城市第 j 項指標數值, $\max x_j$ 、 $\min x_j$ 分別表示在樣本期 T 內所有城市第 j 項指標原始數據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加入時間年份變量後,熵值法計算指標權重的具體步驟如下:

(1) 計算指標貢獻度:

$$P_{ijt} = Y_{ijt} / \sum_{t=1}^T \sum_{i=1}^m Y_{ijt} \quad (3)$$

(2) 計算各項指標對應的信息熵值:

$$E_j = -(\ln mT)^{-1} \sum_{t=1}^T \sum_{i=1}^m P_{ijt} \ln P_{ijt} \quad (4)$$

(3) 計算各項指標的差異性系數:

$$g_j = 1 - E_j \quad (5)$$

(4) 最終計算出各項指標的權重:

$$W_j = g_j / \sum_{j=1}^n g_j \quad (6)$$

3. 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綜合評價

本文主要從各個城市統計年鑒、香港統計年刊和澳門統計年鑒中收集粵港澳大灣區 11 個城市 2010~2021 年的相關指標數據,部分指標數據從具體部門官網獲取,部分缺失數據採取特殊處理,在進行無量綱處理後,進一步得到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綜合水平,結果如表 2 所示。

根據評價結果得到以下結論:總體上來看,從 2010 年到 2021 年,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逐年穩步提升,整體均值從 0.223 上升至 0.329,增長了 47.53%,並且所有城市的高質量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特別是中共報告提出高質量發展的精神以來,粵港澳大灣區經濟保持穩步上升的同時,質量提升速度進一步增加,2017 年以前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年平均增速為 3.53%,而 2017 年以後的年平均增速為 3.73%,經濟高質量發展態勢持續向好,港澳與內地優勢互補,互惠互利,創造出粵港澳大灣區廣闊的發展空間,共同推動了區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城市層面上,粵港澳灣區內 11 城市之間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呈現出較為明顯的非均衡性和穩定性。首先,非均衡性主要表現為港澳與珠三角 9 市、廣深珠與其它珠三角城市之間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距。根據 2010~2021 年各城市經濟高質量水平的均值來看,香港、澳門的均值分別為 0.451 和 0.493,整個珠三角地區的均值僅為 0.282,灣區內排名首位的澳門的高質量發展水平是位於尾位的肇慶的 2.86 倍;此外,珠三角內的城市也存在著較大差異,深圳、珠海、廣州三個城市的均值為 0.336、0.290、0.306,明顯優於其他 6 個城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珠三角 9 市中排名首位的深圳是位於末位的肇慶的 1.95 倍。其次,穩定性主要表現為灣區內各城市的經濟高質量

發展水平基本上呈現上升趨勢,並且排名基本穩定,2010~2021年間,世界局勢平靜的湖面下有不少洶湧的暗流,中美貿易摩擦、英國脫離歐盟、新冠疫情全球性爆發等諸多事件,尤其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導致全球經濟動盪時,粵港澳大灣區內僅有個別城市如香港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出現了小幅波動,但香港、澳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絕對值在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中仍處於領先地位,體現出了良好的經濟韌性。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顯現出上升趨勢,表明這些城市經濟韌性較好。

表2 2010~2021年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水平

城市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均值
香港	0.420	0.425	0.431	0.431	0.439	0.444	0.452	0.465	0.477	0.479	0.461	0.457	0.451
澳門	0.401	0.422	0.467	0.459	0.464	0.469	0.479	0.501	0.515	0.530	0.552	0.563	0.493
廣州	0.234	0.250	0.269	0.286	0.276	0.287	0.296	0.305	0.326	0.345	0.349	0.378	0.306
深圳	0.279	0.287	0.315	0.325	0.301	0.304	0.309	0.319	0.348	0.369	0.389	0.429	0.336
珠海	0.252	0.266	0.281	0.302	0.291	0.278	0.273	0.283	0.295	0.310	0.304	0.310	0.290
佛山	0.141	0.163	0.178	0.184	0.183	0.188	0.204	0.216	0.235	0.242	0.250	0.262	0.210
惠州	0.124	0.138	0.168	0.179	0.176	0.189	0.195	0.205	0.205	0.213	0.219	0.230	0.192
東莞	0.181	0.189	0.211	0.231	0.218	0.221	0.228	0.233	0.249	0.255	0.264	0.279	0.234
中山	0.174	0.193	0.207	0.211	0.201	0.199	0.207	0.222	0.224	0.230	0.244	0.252	0.217
江門	0.117	0.130	0.145	0.160	0.169	0.192	0.205	0.219	0.233	0.248	0.239	0.241	0.198
肇慶	0.126	0.129	0.139	0.144	0.144	0.159	0.171	0.196	0.194	0.207	0.197	0.213	0.172
均值	0.223	0.236	0.256	0.265	0.260	0.266	0.274	0.288	0.300	0.312	0.315	0.329	--

需要特別提出的是,澳門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雖然經濟發展備受打擊,個別年份的經濟總量收縮達三分之二以上,但根據測算數據,澳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粵港澳大灣區仍處於前列,主要原因在於,根據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指標,澳門在對外開放、生態發展、民生共享、科技基礎研究等方面具有特定的優勢,顯示出在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中澳門的前列位置;同時,2010~2021年內灣區內各城市的排名基本穩定,香港、澳門、深圳始終位居前三位,廣州上升1位,超越珠海,惠州、東莞保持不變,肇慶下降1位,中山下降2位,佛山上升1位,江門上升2位,排名第9位。總體來說,樣本期內各個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不斷提高,排名相對穩定,四大中心城市處於領先位置,其餘城市仍有較大發展空間,需要進一步加強城市間的交流與合作,推動優勢互補、區域一體化融合發展。

五、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問題剖析

1. 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協調機制需要優化

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面臨著“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帶來的獨特挑戰。不同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環境,造成香港、澳門與內地在政策制定、規則執行等方面交流困難,存在顯著差異,不同的剛性制度和複雜的行政程序成為產生合作與推進合作的主要障礙。一方面,香港的“策略規劃”更側重於城市規劃設計,主要是為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提供參考,與內地的綜合性發展規

劃“五年規劃”有很大不同；另一方面，原有的協調機制已無法滿足新形勢下的粵港澳合作需求，關鍵在於建立一個在三地通用的“遊戲規則”。除此之外，粵港澳各地區多從自身利益出發制定自己的經濟政策，極容易造成重複建設和惡性競爭，急需一個跨省級的行政組織和機構，在協調各方利益的基礎上來對區域內的分工協作進行統籌管理，實現區域資源的優化配置。

2. 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素流動不暢

三個不同的經濟體、三個不同的關稅區、三種不同的法律環境，造成了區域市場的無形分割，不同的行政區域邊界、不同的法律和規則體系，阻礙了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充分自由流動，既使各地的資源優勢得不到充分發揮，也不利於粵港澳整體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三個獨立的市場體系在經濟制度、行政體制、財政體系、貨幣發行制度以及經濟發展規劃制定方面完全獨立；三地的關稅標準、資金流通制度、對外開放程度、對外經濟政策也有由來已久的差異，這對於三地的合作存在較大的阻礙。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經濟體量巨大，但區域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象相當嚴重，地方保護主義使產業要素流動受阻，難以形成公開透明、統一協作的共同市場，灣區經濟的集聚效應和規模紅利難以得到充分發揮。

3. 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產業協同效應不足

當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網絡發展背景下，城市間互動明顯，由於資源稟賦、國家產業政策引導等因素，區域經濟一體化帶動地區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同時也導致了產業同構現象的產生。從產業活動布局的歷史變化來看，粵港澳大灣區某些城市之間存在較為突出的產業同構現象，產業關聯度不強，產業鏈條不完整，離科學、合理、緊密的產業合作還有一定的距離；同時核心城市並未利用關聯產業發揮對非核心城市的帶動作用，珠三角地區在製造業方面趨同程度較高，容易造成現有資源浪費，原有的互補性垂直產業分工逐漸被同質化的競爭代替，不利於未來的長遠發展和灣區整體競爭力的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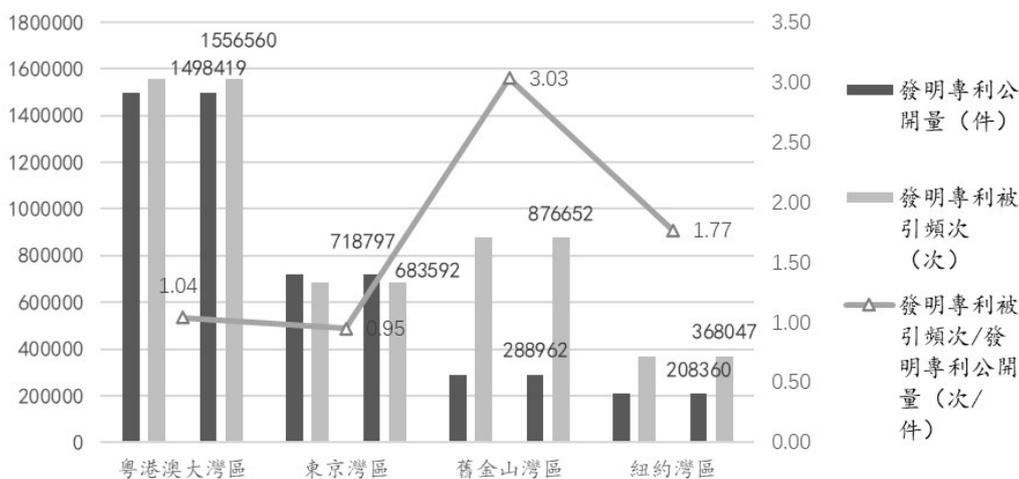


圖 2 2016~2020 年間四大灣區專利被引頻次與發明專利公開量對比

資料來源：《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發展報告(2021)》

4. 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創新質量不高

粵港澳大灣區聚集著大量人才資源、技術資源，創新潛力巨大，但與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等國際知名灣區相比，仍存在創新質量不高、創新動能不足、創新成果轉化率不高等問題。

根據《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報告(2021)》數據,2020年粵港澳大灣區發明專利總量為36.59萬件,遠遠超過東京灣區的15.30萬件、舊金山灣區的6.39萬件和紐約灣區的4.66萬件,發明專利的數量居世界首位,但在發明專利質量(發明專利影響力)上,雖然略高於東京灣區,但與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相比還有較大差距。發明專利的被引用次數稱為施引專利數,是衡量發明專利質量的重要指標。施引專利數越高,表明發明專利的被引用次數越多,發明專利的質量也就越高。由圖2和表3可知,與舊金山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的施引專利數明顯偏低,2020年粵港澳大灣區的發明專利公開量分別是東京灣區的2.39倍、舊金山灣區的5.73倍、紐約灣區的7.85倍,2016~2020年五年間,粵港澳大灣區發明專利公開量總量達到149.84萬件,居世界首位,但是發明專利影響力(發明專利施引數/發明專利公開量)僅有1.04,排名靠後,與舊金山灣區的3.03仍然存在較大差距,粵港澳大灣區發明專利的質量和轉化率有待提升。

表3 2021年四大灣區創新數據

指標	舊金山灣區	紐約灣區	東京灣區	粵港澳大灣區
全球創新城市排名	舊金山(3) 聖何塞(1)	紐約(5)	東京(2)	深圳(13)
全球百強創新機構數量(所)	12	4	22	2
世界500強企業總部數量(家)	12	22	40	25
2020年發明專利數量(萬件)	6.39	4.66	15.30	36.59

註:全球創新城市排名來源於:2022年JLL《Innovation Geographies》;全球百強創新機構數量來源於:Clarivate《Top100 Global Innovators 2021》;世界500強企業總部來源於:2021年《財富》世界500強上榜企業;發明專利總量數據為2020年,來源於:《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報告2021》。

六、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推進路徑

高質量發展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努力追求的目標。綜合考慮粵港澳大灣區面臨的發展環境和條件,描繪好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藍圖,推進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基本路徑如下。

1. 加強政策協調

從世界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經驗可以看出,沒有政府參與,單純只靠民間或是企業的經濟聯繫,是不能形成穩固的經濟一體化組織,因此,政府出面簽訂的經濟一體化協議往往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發展的保障。借鑒大多數發達國家設置區域及城市群行政性協調機構的經驗,依據粵港澳大灣區的實際情況,設立具有常務性和權威性的城市群產業發展協調機構,成為產業規劃的執行主體、管理主體與責任主體。加強對區域內產業的管理與協調,科學合理規劃產業鏈上下游布局,促進區域之間產業的良性互動與協同發展。在組織協調的過程中,要兼顧各方利益,結合灣區發展的總體要求,準確把握一體化過程中各城市的產業優勢和產業功能定位,避免產業同構現象的發生。以科技政策協同為基本點,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進行粵港澳三地協同創新的頂層設計,加強各城市的協調與溝通,打造創新的利益共同體。

2. 推動要素流動

粵港澳三地的經濟文化背景和社會制度迥異,不但促使其協調成本高,還導致其人財物、信息、技術等要素存在梗阻、流通不暢。如何破除粵港澳大灣區產業要素流動不暢的桎梏、解決產業要素

自由流通的問題,是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關鍵所在。要加強三地間的制度對接,完善跨區域政府間的協商協調機制,促進粵港澳三地創新要素自由流動、創新主體互動融合。一方面,協調三地口岸的通關模式,簡化通關流程,減少通關時間,提高人員和貨物流動的便利性。另一方面,利用“互聯網+”等高科技手段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共同市場上的信息共享與技術共享,降低由於信息差所帶來的成本,促進資源要素的合理配置,並根據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現狀與城市未來規劃,協調好整體利益與地方利益的關係,優化產業空間布局,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

3. 堅持錯位發展

要避免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同質化,必須堅持產業錯位發展,需要充分利用粵港澳各地的優勢資源,優化區域內與區域間的產業鏈、貿易鏈和價值鏈,促進資源配置的進一步優化與區域協同發展。粵港澳三地的產業互補,港澳主要是第三產業服務業,珠三角以製造業為主。廣州、深圳需要發揮龍頭引領示範作用,充分利用技術資源和創新資源優勢,加快由傳統製造業向高端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轉型升級,大力發展文化創意、會議展覽和旅遊服務等高附加值產業,提升產業發展水平。佛山、珠海等周邊城市應發揮產業基礎、協作配套方面的優勢,加強對產業鏈較長、發展空間較大的產業的對接與合作,引導合理分工,形成自己的獨特競爭優勢。香港可以繼續發揮倉儲物流、金融服務與專業類服務水平國際領先、科技創新能力強、資本開放程度高等優勢,培育利益共享的產業價值鏈,在全球化產業鏈與價值鏈競爭中發揮核心作用。澳門文化旅遊產業發達,與葡語系國家貿易聯繫密切,利於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在構建與葡語系國家的合作交流平台上發揮作用,以產業結構橫向多元化為導向提升澳門經濟的韌性。^⑩

4. 強化創新動能

由於粵港澳大灣區內 11 個城市的資源要素稟賦、經濟發展水平、城市發展目標各不相同,要實現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升粵港澳大灣區的國際競爭力,通過創新實現區域協調發展是必由之路。面對當前城市群經濟發展的現狀,應該大力推動形成並持續優化以創新為核心,以消費、資本、勞動等為支點的經濟發展新動力體系。這樣城市群在新型產業結構體系下,依靠經濟發展新動力,才能更好的適應新時期發展的需要。鑒於粵港澳大灣區創新能力現狀,突破阻礙創新資源在城市間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阻礙,通過高校交流、產研合作等方式構建跨區域合作創新平台。充分發揮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等核心城市的人才技術優勢、高新技術產業優勢和引領示範作用,實現創新資源高度集聚,推動向周邊乃至全國城市的創新輻射及科技共享。努力發揮佛山、珠海等珠三角其他七個城市產業創新的比較優勢,促進生產要素合理流動和創新資源優化配置,聯合打造分工合作的區域創新體系,推動形成新興產業協同發展格局。

5. 貫徹共享發展

共享發展以推進社會公平正義為前提,以推進扶貧脫貧、縮小收入差距為抓手,以推進區域、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保障,以推進共同富裕為目標。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綠色發展與共享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因此,要提高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效率與公共服務設施均等化水平。未來,亟需嚴格把控能耗與排污標準,更加注重經濟發展效率提升,不斷創新發展工藝,提高工業投入產出比,降低工業污染排放與能源消耗,注重生態工程的保護與修復工作,強化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協調關係。同時不斷完善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推進城鄉公共服務基礎設施一體化發展水平,注重解決公共醫療、教育、衛生、就業等與居民緊密聯繫的民生問題,大力提高公共醫療、教育、衛生支持力度,穩定就業水平,提升公共圖書館、博物館等公共場所的容納能力,進一步推動

經濟共享發展。共享發展對於化解粵港澳大灣區以往發展進程中客觀存在的失衡、差距以及由此導致的各種社會矛盾與社會問題,有著極其重要的實踐價值。

6. 完善市場環境

良好的市場環境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因此,要進一步消除阻礙人才、資金、技術和商品自由流通的各種有形或無形壁壘,優化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的市場環境,完善市場共同規制,建立粵港澳大灣區共同市場,全面激發市場活力,深化“放管服”改革^⑩。要營造更加協同、開放和自由的營商環境。對標國際灣區的營商環境建設,打造無差別、統一的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營商環境。廣東省應主動增強與港澳營商環境的協同性,破解制約要素流通的體制機制。推動廣東自貿區開放升級。支持廣東自貿區擴區升級,加快廣東自貿區聯動發展區的對外拓展,將東莞濱海灣新區和中山翠亨新區真正納入廣東自貿區的範圍,從而把南沙、前海、橫琴三個自貿區實現徹底聯通,真正形成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區,進一步擴大外資市場准入,加大外資金融機構的對外開放力度,進一步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① 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

② 萬曉瓊、王少龍:《數字經濟對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驅動》,武漢:《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

③ 陳章喜、顏孫冠華:《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研究》,昆明:《雲南社會科學》,2021年第4期。

④ 孫久文、殷賞:《“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構想》,廣州:《廣東社會科學》,2022年第4期。

⑤ 段秀芳、沈敬軒:《粵港澳大灣區城市高質量發展評價及空間結構特徵分析》,西安:《統計與信息論壇》,2021年第5期。

⑥ 賴文鳳、許萌、吳雨晴:《粵港澳大灣區高技術產業的重心、城市差距與協調》,廣州:《城市觀察》,2021年第2期。

⑦ 陳章喜:《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評估與路徑》,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9年第2期。

⑧ 凌連新、陽國亮:《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武漢:《統計與決策》,2020年第24期。

⑨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⑩ 王鵬、鍾敏:《澳門經濟韌性的評價與提升:產業結構適度多元化視角》,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2年第3期。

⑪ 謝寶劍:《深圳前海區域治理模式創新研究》,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2年第2期。

作者簡介:陳章喜,暨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經濟社會與區域合作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廣州 510632

[責任編輯 劉澤生]